

考镜源流求真, 辨章学术显其识 ——《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》漫议

刘荣平

(厦门大学 中文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[作者简介] 刘荣平(1965-), 男, 湖北洪湖人,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 主要从事古代词学研究。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2 [文献标识码] E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6)01-0127-02

《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)是著名词学家王兆鹏教授的第 6 部专著, 收近年论文 17 篇, 经修葺后编为六辑, 曰词人新话、群体观照、定量分析、传播研究、词籍考订、学术史回顾。

这是一部卓有学术个性并能引发读者深思的好书, 它可能预示今后数年词学研究的走向。谈到学术个性, 不能不提现代词学三大家。龙榆生、夏承焘、唐圭璋先生分别以理论阐发、事迹考订、词集编纂著称, 而且乐此不疲坚持一生, 与当今词学界跟风般研究颇不同趣。三大家之后有叶嘉莹先生, 以西方文论说词, 令诗词界耳目一新。其后有杨海明、刘扬忠诸先生, 皆有精深研究。再后就是王先生, 凭着文献研究、范式批评、定量分析、传播研究一系列坚实的成果, 建立起崭新的研究范式。他的研究已在词学界引起巨大反响。王先生在本书《后记》中概括自己近来所做的工作是还原和建构。如何还原如何建构, 因学识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王先生的还原之功、建构之识可约略言之。

(一)先说还原

第四辑传播研究与第五辑词籍考订占全书一半有余的篇幅。细读之后, 不能不为其搜罗材料之广所叹服, 如第四辑所收《歌妓唱词及其影响——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研究》中的材料就比《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》一书相关章节要多得多; 第五辑所收《晁无咎词话〈骈馘说〉与朱弁〈续骈馘说〉考》查考文献有数十种之多。知情者不难明了个中原因, 一是王先生 10 多年坚持不懈用功于文献研究, 如与同门师友重编的《全唐五代词》就是词学研究标志性成果之一。而且, 王先生鉴于近年来词学考证成果不多, 表示将在今后数年内仍主攻文献, 这确是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二是王先生是词学界较早用电脑检索帮助研究的学者, 不但拥有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全宋词》等计算机检索系统, 而且亲自编制了《宋代词人检索软件》、《宋代诗人检索软件》等, 使用起来既快捷又方便。有此两方面的扎实准备, 犹如双剑合璧, 搜索资料几可无孔不入。

这里着重谈谈第四辑所收《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——宋词的书面传播方式研究》。由于唐圭璋、饶宗颐、吴熊和等前辈对宋词别集进行过专门研究, 今之学者少有兴趣和勇气再作全面探讨。事实上, 诸家各有得失, 即使综合他们的见解, 取长补短, 亦不无裨益; 又由于一些新的词集和相关资料被发现; 再加上一些书目研究的成果诸如《宋人别集叙录》、《宋人总集叙录》等相继推出, 因而写作一部代表当今词学研究水平的《宋词别集版本考》实有必要。王先生用力探讨词别集在宋代的流布情况, 其目的在于建构词籍版本与词人影响的关系, 因而凡与词别集传播的蛛丝马迹, 尽皆网罗, 不知不觉中建构了

一些词集版本考辨的原则与方法。笔者试总结如下:

1. 首查书目,书目中出现的词集名是索解宋代词集版本的金钥匙。中国有多少公私书目,未见有确切统计,偶见几种书目著录某种词集是容易的事,关键是全部书目著录词集的情况。王先生主编的《宋词大辞典》(凤凰出版社 2003 年版)附录《历代书目著录的宋词版本目录序跋》,书目达 125 种,可谓全矣!每种书目罗列收词情况并录序跋。因之王先生考察宋词别集版本递藏情况,其所掌握的书目资料比一般词学研究者要多得多,更容易注意到别人未发现或漏掉的资料。

2. 次查序跋。序跋多有收藏和刻印情况的交待,据此或可推测某本出自某本,乃常识也,一般考证家很容易做到。王先生鉴于海峡两岸隔绝多年,书籍不能互通有无,遂于 2003 年赴台湾成功大学与王伟勇先生合作研究宋词版本,多有发现,书中屡见交待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收藏词集情况。如考张孝祥《于湖词》,在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查到张钧衡《适园藏书志》所载李子仙影宋钞本,经检原书,补录了《适园藏书志》未引录的吴宪澄手书题跋。

3. 再查笔记小说。宋代文人雅好文艺,每见词集,喜欢载入笔记小说中,以助谈资,颇能反映词集传播情况。这是王先生改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词集版本的一大创举,为以前宋词版本考证家所不及。如考曹组《箕颖词》,据章定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》考出曹组生前以滑稽词传世,声名不佳,其子曹勋编辑乃父诗文集不收词,是“盖父之过”,可资考见宋人对待俗词的心态。

4. 重视正误与补漏。如考周邦彦《片玉集》、《清真集》,著名词集校勘家吴则虞先生有校点本《清真集》,其附录《版本考辨》考周邦彦词集版本甚详,每见学者称引。王先生通过重新研究,纠正吴先生错误若干,又补吴先生校点本未收序跋 3 篇,以广流通。

(二)次说建构

10 年前,王先生和刘尊明先生发表《历史的选择——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》(《文学遗产》1995 年第 4 期),试图以新方法评估词人的词史地位,相对于历代印像式的评价更为科学合理,屡见各种著述转引其统计数据,确实在词学界掀起了计量分析的风气。然此文存在一些统计方法的不足,即 1 篇论文与 1 部著作同作 1 项成果统计。本书个别论文仍沿用此法。王先生清醒地意识到:“无法顾及具体数据的质的规定性”,“只能部分说明问题”。这种自觉的反省意识促使他更加注意统计方法的使用,本书《宋词作品量的统计分析》、《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》在统计方法上并无可挑剔之处,其结论完全令人信服。诸如“当作品量达到一定限度后,词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会因为作品量的差异而有所区别”。“精英词人群出现的周期是 50 年,即在约每隔 50 年,会产生一批精英词人”等等,令人耳目一新。王先生曾指出个别统计数据,可能存在误差,笔者以为不会影响到结论的成立。

王先生目前已发表的文章集中探讨宋词的传播,主要从口头与书面两个角度去研究,这是由词传播的特性所决定的,当然还有其它的传播途径,诸如石刻、题壁等。《歌妓唱词及其影响——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研究》已上升到理论的高度,通过多视角多侧面的论证,认为:歌妓的演唱扩大了词的艺术魅力;歌妓演唱对宋词的题材取向和风格基调的形成有制约性的影响。甚是。此文在《文学遗产》2004 年第 6 期刊出时,因篇幅所限,删掉 1 万多字,今书中全录,得以一窥全豹,阅读时感到逻辑更清晰一些。此文尚需与谭新红《宋词传播中的男声演唱》(《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)以及诸葛忆兵《宋恋情词情感价值评估》(《宋代文史考论》,中华书局 2002 年版)并读。前文考察宋词传播的“另一半”,后文讲到恋情词(主要指文人与歌妓)的“游戏规则”,三文并读,可立体地多维度地了解宋词传播的表象与实质。《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——宋词的书面传播方式研究》尚处在材料考辨的阶段,欲建立宋词书面传播理论,尚俟时日。但传播学研究与版本学研究的结合,已使我们看到了以前不甚注意的词籍流通形式。

昔章学诚论学有云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但如何“辨章”、“考镜”?读王先生书,不难知之。

(责任编辑 何坤翁)